

The Divergence between Economic Methodologie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Their Discourse Power in the Changing Society

Hou Weimin

Abstract: As a historical science,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is a multi-hierarchical theoretical system, which consists both of essence and representation in line of logic and prescription and evolution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In terms of logic,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rxist economics and the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can be seen from the fact that the former stresses the integrality and the dialectical rationality of the research object, while the latter focuses on the formal rationality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two approaches exists in the fact that the former stresses the collective rationality, which means the essence is revealed in the dynamic evolution, while the latter stresses the individual rationality, focusing on the static characteristics and partial laws. The core of Marxist economic methodology i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dialectics, which in their turn determine that ontology occupy a dominant position in Marxist economics. The concerns of the Marxist economic methodology are mainly riveted upon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improvement. The mainstream Western economics is based upon the premise of an unchanging current economic system, which, for all its mathematical and formalistic analysis, is lacking in persuasive power in face of reality and inadequate in foresight. The two methodologies reflect different value judgments and diverse discourse-power implications, and will lead to diverging theoretical standpoints and real-world designations. Therefo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economics actually faces with a variety of tasks in its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exploration: (1) The elements of time should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visual field of political economy. That i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internal contradic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should put forward new category and concept of economics, and construct the economic paradigm and system suited to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2) The principle of value neutrality in economic methodology should be abandoned. The mathematical analysis tools are neutral, but their axioms and assumptions are not. We should turn the basic principles in Marxist economics into axioms and assumptions compatible with modern mathematical analysis, and give a more persuasive, forward-looking explanation to contemporary economic phenomena by applying mathematical models. (3) Treat and handle correctly the transfer of discourse power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theory system. We should always be discriminating while promoting with critical thinking and scientific attitude the exchange and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theories.

Keywords: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ology; essence and presentation; history and logic; discourse power

Author: Hou Weimin earned his PhD fro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in 2008. The positions he now holds include: director of Research Office in Academy of Marxism of Chin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professor, deputy director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ecretary of China Socialist Economic Law Research Institute, deputy secretary of Chinese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Foreign Economic Theory. His research interest chiefly covers: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of China and abroad, China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and practice. His publications ar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Economic Growth*, *Rural Migrant Workers' Labor Remuneration and Employment Securit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wo Unwavering Adherences, Avoiding Both the Old Path and the Erroneous Path*.

經濟學方法論分野及其在變革社會中話語權含義

侯為民



[摘要] 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是內嵌於理論體系之中的，方法論的性質決定着理論體系的科學性與自洽性。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歷史科學，是包含着多個層次的理論體系。它既包括着邏輯意義上的本質與表象兩個層面，也包括着歷史層面上的規定性與演化性。就邏輯意義而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分歧在於，前者更重視研究對象的整體性和辯證理性，後者更注重研究層面的形式理性和工具理性。就歷史層面而言，前者注重集體理性，即從動態的演進中揭示其本質；後者則注重個體理性，更注重其靜態特徵和局部規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的核心是唯物史觀和辯證法，這決定了本體論在

經濟學的主體地位，其關注點更集中於制度改進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而西方主流經濟學則以現實經濟制度不變為前提，這使其數學形式主義的分析缺乏現實說服力和對未來的預見力。兩種方法論隱藏着不同的價值判斷和差異化的話語權含義，在社會變革過程中會導致不同的理論立場和現實指向。在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的重建面臨着多重任務，需要不斷創新和探索：（1）應將時間要素重新納入政治經濟學研究視野。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和內在矛盾分析入手，提出經濟學新範疇、新概念，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濟學範式和體系。（2）摒棄經濟學方法論中的價值中立性原則。既要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新的數學分析工具，更要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轉化為適合於現代數理分析的公理和前提假設，並在此基礎上運用數學模型對當代經濟現象作出更具有說服力和前瞻性的解釋。（3）科學應對理論體系構建中的“話語權轉移”。一方面，在借鑒和運用西方經濟學術語、概念、模型時，注意提高鑒別能力；另一方面，用批判思維和科學態度促進理論的交流與融合。

[關鍵詞] 政治經濟學 方法 本質與現象 歷史與邏輯 話語權

[作者簡介] 侯為民，2008年在中國人民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系統研究會副會長；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技術進步、制度變革與經濟增長》《城鎮化進程中農民工的勞動報酬與就業保障》《科學發展觀與中國經濟改革和開放》（合著）等。

隨着中國經濟改革的深入發展，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學術研究狀況發生了巨大改變。適應於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政治經濟學研究從“批判”語境更多地轉向了“建設”語境，使得圍繞經濟學方法論的爭論日趨激烈。在批判和借鑒的選擇過程中，西方主流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對立開始超出學術範疇，而演變為話語權的爭奪了。客觀地說，自從政治經濟學成爲一門獨立的科學以來，其研究路徑方面的差異雖較少受到重視，但方法論的巨大分歧卻是一直隱含於經濟學觀點之中的。正如一切新生的科學一樣，方法論帶來的差異往往祇是在經濟體系完成後，纔真正顯露出來，但經濟科學由於對人們利益的關注，常常是將這種分歧帶入爭論的漩渦。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產生以後，圍繞方法論的爭論在現實中更多地體現出意識形態的對抗性質也就不難理解了。實際上，方法論的差異性既可以源於立場性，也可以源於邏輯思維和研究視野的不同。任何一個不帶偏見的人，祇要認真分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哲學基礎的差異，就可以發現兩者的對立是一種客觀存在。而這種對立，不過是現實經濟生活中對立性矛盾的思維投射和學術表述而已。

一 歷史視野、理性秩序與經濟學本質

對經濟科學歷史性質的不同理解，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區分的一個重要維度。這涉及對政治經濟學真正內核的理解和認識。歷史固然是現實不可以再現的，但卻是可以理論再現的。如果不承認後者，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就無從談起。就方法論層面而言，承認經濟社會發展歷史的理論再現的必要性，涉及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確立理性在經濟學研究中的地位，使對社會演進的必然性和經濟活動的內在規律的揭示成爲可能。換言之，就是要科學地區分本質與現象。二是如何處理好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使通過分析得出的抽象結論在理論體系中準確地再現。

（一）政治經濟學的歷史視野與方法論前提

政治經濟學並不是建構主義的產物，也不是一門純粹以解釋爲指歸的科學。政治經濟學關於理性秩序的認識不是以人們頭腦中對世界圖式的設想爲基礎，而是以現實的經濟活動爲基礎。政治經濟學所要解決的，是“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即以歷史的演進和現實的問題解決爲導向。因此，它所闡述的原理不可能像數學中的等式那樣具有可逆性，而祇能是以“原因—結果”這一單向維度模式而體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德國思想家恩格斯（F. Engels, 1820—1895）認爲：

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歷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產和交換的每個個別發展階段的特殊規律，而且祇有在完成這種研究之後，它纔能確立爲數不多的、適用於生產一般和交換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規律。^①

政治經濟學本身的歷史性質，決定了其在方法論方面的分歧也具有着歷史的性質，即體現爲研究視野的歷史演變。

從經濟思想史角度看，早期的政治經濟學在發展過程中經歷了歷史的嬗變。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還處於萌芽狀態時，商業資本的發展更多地體現爲資本積累的初始條件。因此，以研究流通領域爲中心的重商主義經濟學說曾一度在歷史上佔據主導地位。不過，這種初級形態的政治經濟學的地位在威廉·配第（W. Petty, 1623—1687）那裏第一次被打破。隨着現代工業的發展，由亞當·斯密（A. Smith, 1723—1790）等人創立的政治經濟學出現了，這種反映工業資本意志的自由主義經濟學開始取得了主導權，並且在李嘉圖（D. Ricardo, 1772—1823）那裏達到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巔峰。之後，古典政治經濟學開始分化。薩繆爾森（P. A. Samuelson, 1915—2009）認爲：“一個世紀以前，經濟學的大樹分出了枝幹。一個枝幹起源於馬克思的《資本論》（1867、1885、1894

^① [德]恩格斯：“反杜林論”，《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3卷，第489—490頁。

年)以及他的重新被人發現的早期經濟學著作”，“另一個枝幹通過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而發展成目前的現代主流經濟學”。^①顯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當今西方的所謂主流經濟學有着共同的源頭，即均發源於古典經濟學。相比而言，馬克思（K. H. Marx, 1818—1883）延續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依據理性甄別經濟行為背後的內在本質的傳統；西方主流經濟學則延續了力圖刻畫其現實形態的努力，重視以分析經濟行為主體和現象的功能性聯繫作為研究範式。兩者的研究路綫是迥異的。比較起來看，馬克思更注重不同範疇的異質性和統一性，更重視辯證理性在把握事實方面的作用；而後來發展出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則強調均質性和（量的）差別化，更加重視形式理性和工具理性。因此，這也就不難理解，西方主流經濟學在承認現實的合理性的同時，往往喪失對經濟制度本身的詰問；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關注點更集中於制度改進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在於，力圖在社會經濟運行的表象下探求具有機械力學性質的內在規律性。它將現象與本質區別開來，體現出樸素的唯物論傾向；而其承認經濟規律的客觀性，則體現出樸素的辯證法色彩。但它也存在着先天的不足：在分析對象上，它將經濟現象的外部聯繫與其內部聯繫混同；在體系構建上，不是按照由簡單到複雜的順序，而是越過中間環節，去論證經濟範疇的具體而複雜的現實形態與抽象而簡單的理論形態的統一；在對經濟範疇的界定上，它缺乏對經濟範疇的起源、發生、發展的把握，祇是簡單地將範疇視為既定前提。

在亞當·斯密、李嘉圖時代，由於資本的統治還沒有完全鞏固，對財富增長的解釋始終基於社會分工和生產勞動的基礎上。十九世紀初，馬爾薩斯（T. R. Malthus, 1766—1834）、薩伊（J. B. Say, 1767—1832）等脫離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立場，使經濟學發生了一個轉折。最初從古典經濟學分化出來的西方經濟學各流派，如歷史學派、奧地利學派、老制度學派等，都延續了薩伊等人的傳統，即不再將社會財富增長置於分工、勞動、社會化生產的視野下。由此，西方經濟學對古典學派關於價值理論與勞動之間的抽象思考日益被忽視。而從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分裂出來的邊際學派，更是將經濟學研究對象從社會歷史情境中拉出來，其經濟哲學方法則轉向思維的邏輯原理的結構層面，成爲一種非思辨性的技術性方法。最終，祇有新古典經濟學前身的邊際學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爲主流學派，其他學派則被現代西方經濟學界有意識地邊緣化、異端化了。這種以所謂“主流”的辦法來將其他經濟學派邊緣化的做法，儘管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義經濟學時代^②，但在現代西方社會則是進一步強化了。從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邏輯看，其背後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當資本力量特別是工業資本的統治佔據歷史舞臺中央後，價值和財富在經濟學體系中祇能從屬於資本並從資本角度來說明了。

就方法論而言，自古典經濟學以來的分歧，反映出的是經濟科學研究的視角變化，即對經濟現象和經濟本質側重點的不同。本來，無論是技術變革、社會分工演進，還是社會勞動組織形式的變化，都是歷史活動的產物。不幸的是，在西方經濟學的視野中，歷史活動成了其研究的結果而非起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分野，顯然與研究視角的這種差異性有關。對於前者來說，現在的市場關係和交換關係需要在一種發展的、動態的情境下來理解，而且要根據現實的生產活動基礎來解釋。而後者則不然，它們更傾向於市場的不變性質，從而將勞動永遠地從屬於資本統治的範疇之內。

不過，經濟學作為一種抽象理論，如果脫離時間軸本身，其解釋力就會喪失殆盡。在面對經濟現象和經濟資料時，如果不能科學界定這些現象和資料的性質，則經濟分析本身就是不可靠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經濟學方法論的確立是先於理論體系本身的，它恰恰是構建經濟學體系

① [美]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1992），高鴻業等譯，下冊，第1292頁。

② [美]埃里克·賴納特、阿諾·曼·達斯特：“另一種教規：文藝復興經濟學史——論以非物質和生產為基礎的教規在經濟思想史和經濟政策史中的作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上冊，第306頁。

的基礎。美國經濟學家熊彼特（J. A. Schumpeter, 1883—1950）在《經濟分析史》中指出：

分析工作必然要以一種分析前的認識行為作先導，藉以提供分析工作所需的素材……這種分析前的認識行為稱之為想象。有意思的是，這種想象不僅必須在歷史上先於任何領域中分析努力的出現，而且每當有人告訴我們，從某一角度觀察事物，而這個角度的來源不能從這門科學原有水平的事實、方法與結果中找到時，那麼，這種想象也許會重新進入每一門已經確立的科學發展歷史之中。^①

這實際上意味着，對經濟學素材的選取本身必須遵循客觀性原則，並且這種客觀性需要達到“歷史的真實”，即必須在動態變化的狀態下理解它。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要達到歷史方法和邏輯方法的一致，以確保理論自身的自治性。否則，隨着歷史的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相關邏輯範疇就會變化，需要不斷地修補或者推翻，而失去對現實經濟生活的解釋意義。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將唯物史觀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法論的靈魂纔是恰當的。唯物史觀的核心是用動態的、發展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結構的變化，這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個超越：“確切無疑的是，關於如何超越靜態結構的課程——也許是唯一重要的課程——來源於馬克思、凡勃倫和熊彼特。”^②在馬克思看來：“唯一重要的就是，把兩種事實盡量準確地研究清楚，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發展階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同樣準確地把各種秩序的序列、把這些發展階段所表現出來的連貫性和聯繫研究清楚。”^③在這裏，思維層面和邏輯世界裏的序列，是通過其時空順序和因果關係而具體地體現的，因而，在方法論層面上體現出的特徵必然就是一種歷史的理性。由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具有了歷史科學的性質，其概念範疇、核心觀點、基本結論纔經受住歷史的檢驗。而西方經濟學由於脫離了歷史的情境，祇能在其內部不斷演革，掀起所謂的“革命”，用一個“主義”取代另一個“主義”。顯然，當自由主義學者在談論市場均衡、市場效率的時候，他們已經很難將其置於工廠手工業的情境之下了。而脫離具體的勞動形式變化的市場交換，用來分析今天的市場經濟，顯然是沒有說服力的。如果說在經濟學理論中需要有高度的抽象，那麼這種抽象決不能緣於主觀的、隨意的想象，而祇能通過對歷史活動的客觀想象和理性推演。

（二）本質經濟學與表象經濟學的分歧

在歷史的邏輯分析基礎上確立政治經濟學的理论體系，並不意味着其與現實的脫離。相反，由於深嵌於歷史進程中，政治經濟學更應當使經濟現象的本質與表象形成統一。由於西方主流經濟學將其研究視野局限於固定的概念範疇，看不到這些概念範疇本身的暫時性和變化性，必然在修補補中庸俗化為現實經濟活動的單純解說詞。可以說，研究視角的分野本身就意味着方法論的對立，其結果集中體現在本質與表象的統一條件上。

在某種程度上，無論是古典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還是現代西方經濟學，它們都是哲學在經濟領域應用的產物。在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其實內含着西方近代哲學的發展成就。一方面，它包含着一些唯物主義、辯證法的因素，反映了處於上升期的資產階級的歷史合理性和進步性；另一方面，其唯物主義又是機械的和形而上學的，是與辯證法相分離的，從而導致在認識層面上的絕對化和片面化。換言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既包含着本質經濟學的部分內容，又將這種內容與表象經濟學相混同。其方法論上的不完善，割斷了本質和表象之間的內在和辯證的聯繫。

在西方經濟學研究傳統中，一直存在着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基礎：其一是堅持系統的、動態的、有機的哲學思維方式和世界觀。這一研究傳統主要在重商主義者、美國學派、德國歷史學派

① [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朱泱等譯，第1卷，第74頁。

② [英]G. M. 霍奇遜：《現代制度主義經濟學宣言》（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向以斌等譯，第286頁。

③ [德]馬克思：“第二版跋”，《資本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1卷。

那裏得到了體現，由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最終確立了完整的體系，熊彼特及後來的演化經濟學則延續了這一研究傳統。由於堅持系統的觀點，這一研究傳統更注重對事物本質的揭示。挪威經濟學家賴納特（Erik S. Reinert）指出，受德國哲學的影響，與盎格魯-撒克遜經濟學傳統相比，德國經濟學的研究思路始終堅持整體主義的方法；^①馬克思無疑繼承和延續了這一傳統。他通過對德國古典哲學的革命，科學吸收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合理要素，實現了經濟學範式的革命。因此，英國經濟學家霍奇遜（Geoffrey M. Hodgson）認為：“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與德國歷史學派都是同一哲學文化的產物。”^②

其二是從原子論立場出發，堅持靜態的和機械的宇宙觀。這一研究傳統主要體現為重農主義者、邊際革命學派和新古典經濟學等的觀點。亞當·斯密、李嘉圖雖然科學地看到了勞動價值理論的合理性，但他們在論證時更多地是從原子論和機械的哲學觀出發的。而在他們之後，西方經濟學則完全捨棄了關於經濟活動本質的探討，片面地用表象經濟學或者說是實證經濟學替代了本質經濟學。對於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堅持其哲學前提時忽略了哲學本身的發展，美國經濟學家喬治斯庫·羅根（N. G. Roegen, 1906—1994）尖銳地指出：“正當傑文斯和瓦爾拉斯開始為現代經濟學奠基時，物理學一場驚人的革命掃蕩了自然科學和哲學中的機械論教條。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學’的建築師，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設計師，看來都沒有及時地覺察到這種沒落。”^③當人們的理性認識隨着科學發展而突破機械論時，西方經濟學仍然固守舊的思維邏輯，即囿於表象經濟學的那些“表面的聯繫內兜圈子”。^④

誠然，在西方經濟學中也存在着規範經濟學的主題，以探討人類行為和經濟現象的本質問題。但是，本質經濟學在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體系中並不佔主體地位，取而代之的卻是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在早期，其主要思路是通過經驗事實的歸納，得出帶有普遍意義的結論；或是通過經驗事實提煉出的典型前提假設，借助邏輯演繹來推導結論，並用現實資料對結論進行“一致性檢驗”。當不能通過檢驗時，他們並不質疑理論本身即假設的條件，而是將其歸因於干擾因素的存在。二十世紀後，波普爾（K. R. Popper, 1902—1994）的方法論進一步被英國的哈奇森（T. W. Hutchison, 1912—2007）引入經濟學研究，前提假設可以通過直接的演繹猜測，而摒棄了歸納。這樣，其研究視角就進一步遠離了本質研究，而更加關注於表象化的實證性描述了。顯然，這種研究路徑儘管藉“獨立於倫理觀點或規範判斷”排斥了對事物內在聯繫的研究，但並不能保證經濟學分析的“客觀性”。

（三）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

在理論體系的構建過程中，個體和整體、局部和全域的關係是經濟學研究必須克服的矛盾之一。貫徹經濟科學的歷史分析方法，不能僅僅立足於研究視角的變化，研究者的立場實質上並非不可或缺。換言之，經濟科學在方法論上體現的，是理性對歷史和現實的把握。這種理性，總是與研究者的立場相關的。在亞當·斯密那裏，存在着一個隱含的假設前提，即個人的經濟理性行為與社會目標是統一的，個人理性自發和自然地導致集體理性。但是，他的隱含假設的哲學前提是個人主義的，而其現實前提則是建立在工業資本的萌芽期和發展期。然而，當資本邏輯的矛盾開始外在化和顯性化時，現代西方經濟學仍將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个人主義基礎作為一種必然，而將“經濟人”假設作為一種先驗的前提，則顯得不合時宜，其陷入難以自洽的困境也就不可避免了。

實際上，隨着市場交換活動的擴大和經濟組織化程度的提高，經濟學中的“個人”必然在

①④ [挪]埃立克·賴納特：“作為發展經濟學的德國經濟學：從‘三十年戰爭’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下冊，第4頁。

② Geoffrey Hodgson, *How Economics Forgot History: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Specificity in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2001), 56.

③ Nicholas Georgescu Roegen,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3.

歷史維度呈現出越來越從屬於統一市場的特徵。因此，如果繼承古典經濟學的傳統，現代經濟學仍需要將人預設為理性的“經濟人”，那麼，這種“經濟人”就不能單純從傳統的個人層面來界定。一般而言，個體理性強調的是個人直接利益的最大化，相比之下，集體理性則更與經濟活動的穩定持續性和高效率性相關，涉及總體的效率、社會內部的穩定（包括社會公平）和經濟組織的長期利益。現代經濟生活的實踐也表明，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之間的衝突是時刻存在着的，有時還以尖銳的、極端的矛盾呈現出來。也就是說，社會成員的個體理性在現實中往往也會導致集體的非理性，結果使全體利益受損。

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問題的分析，是對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關係的最好詮釋。在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中，如公共選擇理論、博弈論，用“利益集團”概念取代了“階級”，但沒有改變事物的本質。在私有制的前提下，企業主的個體理性和集體理性更趨向於一致，集體理性往往壓倒個體理性，這是因為其組織化能力更強。而對分散化的市場力量來說，個體理性的最優往往不會導致集體理性的最優。為此，馬克思指出，當單個工人或個體勞動者在與資本家談判或鬥爭時，他絕不是在與單獨一個資本家在博弈。在這裏，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存在着巨大的鴻溝，其選擇最終往往是臣服於集體理性。例如，在關於最低工資標準的爭論中，工人們往往更在乎個人的實際收入水平，而難以認識到其與勞動付出之間的關係。對企業主而言，在普遍的低工資水平下，儘管他們通常不會因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而導致實際利益的損失，但由於標準的提高意味着工人加班時間的延長難以持續，其理性選擇顯然是不願意提高標準，並且這種選擇會更多地體現為集體觀念和組織化的行動。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同樣如此，當西方國家用“市場經濟國家”認定標準，打亂中國內部經濟的組織化能力，中國企業就會被國際壟斷資本各個擊破。其個性理性的現實化往往呈現出與集體理性相反的結果，並意味着集體長遠利益的喪失。

儘管西方主流經濟學將個體理性奉為圭臬，但他們並不能無視關於理性人假設本身的局限性，而且也認識到理性秩序的歷史演進性的現實。不過，他們並不將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作為經濟學方法論的內在前提，而是試圖通過對“理性”外延的擴大彌補其缺陷。例如，美國經濟學家史密斯（Vernon L. Smith）就試圖用建構主義理性和生態理性來調和這一矛盾。他一方面認為，“理論幾乎全部都是建構主義的產物”；另一方面又認為，“一個建構主義計劃越早經受生態過程的選擇，人類就越早知道其是否能夠生存下來”。^①顯然，其關於理論建構的觀點，針對的是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被替代的設想，而唯獨缺少了關於主流經濟學自身缺陷的反思。

二 作為整體性學說的政治經濟學方法論

在經濟思想史上，經濟學作為一種現實性、發展性的學說，其方法化基礎經歷了從個人主義向整體主義的轉向。這種轉變的基礎是現代哲學的發展，它意味着經濟學需要從傳統的經驗層面走向理性的科學層面。固然，經濟學作為歷史性的科學，需要大量的經驗材料為基礎。但是，對這些歷史和現實材料的分析，卻需要借助於現代科學思維，首先是要借助於科學的抽象力。在這個意義上說，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的差異，反映着人們對待抽象方法的不同態度和運用抽象力能力的差異。

（一）整體性研究中的邏輯方法與歷史方法

在經濟學研究中堅持整體主義的方法論和運用好抽象方法，涉及兩個層面的問題。其一，堅持系統論的方法，在時間維度上將社會經濟制度的變化與經濟行為的規律作為系統自身的演進來認識，剖析其產生發展的內在關聯性。其二，堅持普遍聯繫的方法，在空間維度上將社會的經濟活動和經濟現象放在統一的整體中，用有機的聯繫的觀點來分析，而不是割裂其聯繫。換句話

^① [美]弗農·L. 史密斯：《經濟學中的理性》（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李克強譯，第12—17頁。

說，就是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要達到內在的統一。爲了維持理論體系的自治性，關於社會經濟活動的解釋需要同時構築時間與空間兩個維度，以保證經濟分析能夠維持在統一的邏輯框架內。這樣做的目的，既爲了防止邏輯論證的結論超出歷史視野，成爲對歷史事實的胡亂嫁接；也爲了避免經濟分析囿於空洞的猜測，缺乏現實材料的支撐。

在《資本論》中，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是作爲一個整體來分析的。在馬克思看來，從起點商品到終點地租，貫穿的是價值規律及其作用形式的邏輯進程，體現的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關係的整體。“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爲思想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着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於對於世界的藝術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①祇有從整體性出發，經濟學理論體系纔能避免割裂事物發展之間的聯繫，從而避免片面化的分析。馬克思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相當廣泛，主要包括：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社會總資本供求平衡的實現機制、社會總供求非均衡的原因及條件、社會總勞動的分配和控制等。馬克思宏觀經濟分析的主要特徵，是注重宏觀經濟理論的制度性和宏觀經濟理論的整體性。同時，馬克思的這種宏觀經濟分析又是與微觀分析相聯繫的。馬克思對企業制度與產權結構、個別資本的循環與周轉、市場機制與供求關係、價值決定與價值實現等問題的分析，構成其微觀經濟分析的主要內容。將個別和微觀經濟問題置於整體和宏觀經濟運行中進行研究，是馬克思微觀經濟分析方法的主要特點。無論是宏觀分析，還是微觀分析，馬克思都是以科學的勞動價值論爲理論基礎，都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決定性作用爲前提。馬克思雖然沒有在論述中明確區分宏觀與微觀經濟問題，但並不妨礙後來者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方法，建立起馬克思主義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

整體主義方法需要借助於合理的邏輯。邏輯的運用是任何經濟學流派都不可缺少的，但將辯證法運用與歷史方法相統一，則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特點，“不鑽研和不理解黑格爾的全部邏輯學，就不能完全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②。在馬克思的分析中，邏輯方法與歷史是有機聯繫、相互統一的。邏輯的方法是在研究社會經濟現象時所採用的思維推理法，即依照思想邏輯的進程和經濟範疇的邏輯聯繫，從比較簡單的經濟關係和經濟範疇，逐步上升到比較複雜的具體的經濟關係和經濟範疇，闡明社會經濟現象和經濟過程的發展進程。歷史的方法則是在研究社會經濟現象時，按照它的歷史發展的實際進程來研究經濟現象和經濟發展過程。這樣，就使得經濟學理論體系既能在整體上反映客觀世界的全貌，又能結合具體的歷史進程體現出各種範疇的本質及其演化規律。

在經濟學科的演變過程、特別是有關方法論的論爭中，馬克思關於經濟學體系的歷史主義觀點，常被誤解爲等同於歸納法或歷史決定論。這實際上是源於批評者的實證主義和普世主義立場。實證主義用客觀的理論體系取代主體的認識，排斥了主體的反思能力，因而是一種肯定現實的“順從主義”哲學。^③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如果是立足於實證主義的前提，即使人們使用歸納法，其目的也僅僅是爲了獲得具有一般性和決定性的結論，而不是具有生動的歷史性和反映事物內在規律的科學性的結論。^④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並不主張歷史決定論，也並不致力於用先驗的邏輯解釋一切事實。

（二）歷史回溯式的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

經濟學說史上的方法論之爭由來已久。早在1883年，奧地利學派的門格爾（C. Menger, 1840—1921）與新歷史學派代表人物施穆勒（G. V. Schmoller, 1838—1917）就圍繞經濟學中的歷史歸納法與演繹分析法展開過論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對這一

① [德]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2卷，第19頁。

② [俄]列寧：《哲學筆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第191頁。

③ 劉繼：《法蘭克福學派對實證主義的批判》，《中國社會科學》1（1988）。

④ [德]哈貝馬斯：《認識與興趣》（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郭官義、李黎譯，第66—67頁。

論戰又進行了重新的審視。在上一論戰中，歷史歸納法與演繹分析在經濟分析中的重要性都無法替代，批判實在論則從根本上否定了前兩者的存在價值。它認為，歸納法得出的結論僅僅限定在經驗層面上，儘管有時也可以得出超過假設的新知識、新信息，但卻是不完整的；而演繹法雖然可以為結論提供邏輯檢驗的規則，但其結論卻是預先蘊涵在假設中的，並不能提供脫離假設的新信息或新知識。批判實在論強調溯因法在經濟分析的重要性，認為經濟理論體系的構建離不開創造性思維，既要賦予事物新的含義、概念或原因，也要藉對事物“表象”的分析，深入到其深層結構，進而揭示整體結構、個別現象與具體經驗之間的因果機制。

從西方非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看，批判實在論是對波普經濟學方法論的邏輯實證主義的超越。批判實在論重視從本體論出發，以“分層實在”為本體論預設，主張堅持回溯法在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地位，以歸納方法和演繹方法作為回溯法的輔助分析工具。^①在其之後，關於經濟學方法論的探討圍繞着本體論、修辭學探討和因果整體論展開，並在勞森（Tony Lawson）、梅基（Dean Maki）等發展和轉化後日益成熟，成為“後凱恩斯經濟學”等非主流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

實際上，在馬克思那裏，回溯法就是科學的抽象法。馬克思認為，儘管任何一個理論體系一旦完成，它的呈現形式都“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但作為研究方法，必須以實在的經濟現實為出發點，包括充分佔有材料、分析所有材料的各種發展形式、尋求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等三個主要環節或過程，最終形成經濟概念、範疇和理論。在具體的理論構建過程中，則需要將上述概念、範疇和理論通過思維活動借助一定的結構形式表達出來。這是一種再現現實的過程，實際上構成了理論體系上的敘述方法。

《資本論》理論體系的構建過程是經濟範疇的辯證轉化過程，也是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過程。這一過程“祇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②，也即“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③。在《資本論》中，商品轉化為貨幣，貨幣轉化為資本，資本轉化為剩餘價值，單個資本循環轉化為單個資本周轉，單個資本轉化為社會總資本，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和轉化為成本價格，剩餘價值轉化為利潤，利潤轉化為平均利潤，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剩餘價值轉化為企業主收入、商業利潤、銀行利息、地租。經濟範疇不斷地由抽象上升到具體，從簡單上升到複雜。整個《資本論》理論體系，就是在這些經濟範疇發生辯證轉化的基礎上構建起來。

可見，在《資本論》中，研究方法和敘述方法是以相反的思維路徑體現出來的。作為研究方法的推理工具就是回溯法，即透過事物表面特徵揭示其內在規定性及與外部事物的相互聯繫，在此基礎上形成概念和範疇，並形成反映內在規律的基本原理。這是一種正向的過程。而敘述方法則反之，採用的是倒敘形式，是將基本原理和科學的概念再現於理論體系中，這是出於運用理論指導實踐的需要。如果沒有科學的抽象法為基礎，如果不是通過回溯法的研究用邏輯思維從整體上把握理論體系的框架，理論體系就不可能達到完整，也無法實現自身的邏輯自治性。總之，研究方法的結果是敘述方法的起端，祇有經過研究方法得出的概念、範疇和理論等，纔能成為敘述方法的對象和材料，成為經濟學體系的基本要素和構件。從根本上來說，這是總體方法的具體體現。

三 經濟學方法論蘊藏的價值判斷和話語權

表面看來，圍繞經濟學方法論的爭論與經濟學的話語權並沒有什麼關係。不同的方法本身，似乎更多地體現為研究的內設前提差異和思維邏輯路徑差異。然而，不同經濟學理論流派的客觀與否並不依賴於其結論，而是依賴於其能否通過正確的方法來達到邏輯推演的結論。從這個意義上說，方法論的分歧實質上就意味着價值判斷、理論指向的對立，從而也就意味着理論體系本身

① 夏華：“關於批判實在論的回溯法的研究——兼論馬克思經濟學的方法論”，《經濟問題》2（2011）。

②③ [德]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9、18頁。

的對立。

(一) 經濟學方法論中隱藏的價值判斷

在社會科學領域，任何一種方法論都有着價值導向，經濟學領域也不例外。在經濟分析和理論建構中，進步與落後、科學與愚昧、公利與私利、公正與偏畸，在這些問題上的取捨，構成了不同的方法論體系。但是，經濟學家的取捨並不是隨機的和無意的：“經濟學家本人是他自己時代和所有以前時代的產物，經濟分析及其成果必然會受到歷史相對性的影響。”^①在某種程度上，個人情境和歷史情境對經濟學家本人有着至關重要的影響；當他在不同研究方法間取捨時，價值判斷在無形中就進入了其理論體系。

經濟學方法論中隱藏的價值判斷有時並不直接通過文本反映出來，而是通過假設和前提來確立的。當西方主流經濟學將“經濟人”假設、“資源稀缺假設”、效用價值論等作為推演的基礎時，在某種程度上就確立了其立場和結論。這也使得西方主流經濟學理論體系更像一個被修修補補的大雜燴，各種相互衝突的邏輯圍繞着資源配置的一般均衡，精心編織着理論之網，卻難以反映出經濟活動本身的歷史軌迹。因此，它常常導致人們對經濟學本身產生困惑：“經濟學是帶着有意識主導的段落、空白的篇章和被擦去的詞的文本，經濟學家可以被認為是研究高度殘缺破碎的文本的讀者……或者更為準確的說法是：經濟學家對真實經濟世界的存在方式的解讀和描述祇能是一個殘缺而又支離破碎的文本。”^②

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同，馬克思並不用精美的數學主義來描繪世界圖譜，“一般均衡”或“市場出清”在馬克思那裏祇是偶然的例外。在馬克思看來，資源的稀缺是一種相對於社會需求的歷史現象，它固然與技術因素有關，但也與資源佔有、使用及社會生產組織程度相關。在價值問題上也是如此，熊彼特指出：“在任何一種具有理性圖式的純理論中，價值作為主要的分析工具，必定總是居於關鍵性的地位。”^③西方主流經濟學將效用作為市場機制分析的起點，但馬克思並不滿足於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現象層面的解釋，他認為價格的本質是價值問題。這一點比將價值歸於效用決定的唯心論顯然更加科學、更加深邃，但也更加抽象。日本經濟學家見田石介認為：“價值理論和價值概念是整個經濟學的最終基礎，是經濟學原理中的原理，是最抽象的理論。”^④這種最抽象的理論要提供最客觀的解釋，就不僅要求可以被客觀量化，也要求其能解釋市場交換過程，還能運用於社會再生產過程和社會分配過程。西方主流經濟學用不可客觀測量的效用取代可以量化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顯然是達不到上述要求的。這是因為，建立在個體主義基礎上的不同商品的效用，是無法加總的。因此，它雖然可以說明微觀現象，但不可能在宏觀上對市場需求和交換比例作出科學的說明。實際上，在市場經濟中，“差不多每一個關係到如此組成的社會的經濟利害關係的投機買賣都含有某種價值理論；價值理論的極小謬誤都會以相應的謬誤傳染給所有其他的結論，在概念中任何模糊的或朦朧的事物，都會在一切其他的概念上引起混亂與曖昧”。^⑤可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個體主義的靜態的方法論，必然導致其在缺乏自治性的同時，失去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力。

在經濟學中，進步和效率是基本的價值追求。但從個體主義出發，進步往往就被局限於技術進步，而較少考慮到經濟組織的進化。同樣，在個體作為主體的情形下，效率就會局限於直接的投入產出效率和利潤率，而較少考慮到生產的外部性問題，更不可能兼顧生態和社會效益。與古典經濟學和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同，馬克思更強調整體意義上的效率，即組織化的效率，並將這種效率與組織演化本身聯繫在一起。馬克思並不要求資本家或企業主本人對資本主義制

① [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朱泱等譯，第1卷，第32頁。

② 田春生，郭政：“對‘中國問題’的經濟學方法論思考”，《中州學刊》11（2011）。

③ [美]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第2卷，楊敬年譯，第324頁。

④ [日]見田石介：《〈資本論〉的方法》（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2），沈佩林譯，第3頁。

⑤ John Stuart Mill, *Principals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some of Their Application to Social PhilosoPhy* (London: Longmans, 1923), 436.

度負責，但在研究中的確又將其作為“資本人格化的代表”，以說明經濟行為與制度間的關係。因為，在馬克思的時代，工人階級的苦難是經濟學必須面對的現實，而作為工人階級聖經的《資本論》必然要科學地解答社會經濟制度的不合理問題。“自由人聯合體”“工人階級的解放”等等觀點的提出，就鮮明地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價值導向。理查·諾曼（Richard Normann）認為，馬克思主義需要從傳統中汲取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一系列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是任何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部分。^①同樣，當公有制與私有制、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處於競爭局面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也要作出相應的價值判斷。

（二）經濟學方法論的意識形態功能和話語權

經濟學方法論根植於哲學的前提和背景，但並不歸於“道德哲學”的內容。不同經濟理論的話語權突出體現在其方法論中的意識形態功能上。經濟學不是說教，但又需要搶奪話語權。這是因為，經濟學對歷史不能置之不理或隨意剪裁，終要面對歷史和現實社會經濟活動的檢驗。

經濟學的意識形態功能是由其自身的學科性質決定的，經濟學是一門社會性的、實踐性的學科。祇有掌握經濟學話語權，纔能使經濟學體系本身對客觀世界產生影響，完成自己的使命。而掌握話語權的最好途徑，莫過於將自己的研究視角作為基礎性的起點，將自己的研究方法作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分析工具。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在觀念上的表述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述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②可見，經濟學方法論與意識形態是密不可分的。在這個問題上，即使置身西方主流經濟學之列的索洛（Robert M. Solow），也不得不承認經濟學方法中暗含着意識形態的功能：

不論社會科學家的意願如何，不論他是否觀察到這一切，甚至他力圖避免它們，他對研究主體的選擇，他提出的問題，他沒有提出的問題，他的分析框架，他所使用的語言，很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③

經濟學的話語權固然需要建立在科學性基礎上，但也與其時代性有關。一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往往會遮蔽其他非主流意識形態，並對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影響力和傳播效應產生干擾。而經濟學方法論則是完成上述遮蔽的最好手段。在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構建中，首先要撇開經濟運行過程中一切紛繁複雜的現象，深入剖析其中最簡單的經濟範疇和經濟過程，再逐步地上升到對複雜的經濟範疇和經濟過程的分析，最後上升到對社會經濟關係整體的分析，因此，最好的遮蔽辦法是掌握對最簡單的經濟範疇、概念的定義權。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就是用一些新的概念、範疇來遮蔽其意識形態指向的。例如，對市場、競爭、效率、產權及生態主義等等問題的界定，都是如此。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不然。它認為上述問題如果不放在資本主義制度這個龐大的、複雜的整體中，不從多種社會關係的整體中抽象出來進行考察，它就沒有意義，“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麼也不是”。^④

事實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對“階級”“資本積累”“貧困化”等意識形態概念的運用，不過是延續了早期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革命的傳統，在反映現實生產關係的理論建構方面進一步創新而已。從根本上說，由於堅持勞動價值理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代表勞動群體的利益，反映勞動者對社會正義的要求，具有濃厚的人本主義特質。對於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回避這種階級性和淡化經濟學背後的意識形態指向，祇能是出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話語權。德國經濟學家韋伯（M. E. Weber, 1864—1920）提出，在面臨價值判斷時，“政

① [英]諾曼：“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中活的東西和死的東西”，《分析馬克思主義新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魯克儉等譯，第50頁。

② [德]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第1卷，第100頁。

③ [美]羅伯特·索洛：“經濟學中的科學和意識形態”，《當代經濟論文集》（波士頓：利特爾·布朗公司，1972），第11頁。

④ [德]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8頁。

治經濟學就必須受制於人類的某一特殊族系……一個德意志國家的經濟政策，祇能是一個德國的政策”。^①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要在全球化條件下取得競爭優勢，更好地代表本國勞動者的利益，在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研究方面同樣要確立自己的話語體系，掌握對經濟理論研究的主導權。

四 構建中國當代政治經濟學要重視方法論中的話語權

在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建，面臨着多重任務。既要立足中國社會的具體時空結構，從不同維度對複雜的經濟現象做科學的解釋，更要對其做整體性的分析和說明；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論，又要面對各種經濟學流派和思潮的競爭和衝擊；^②既要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意識形態領域發揮好作用，又要有效借鑒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成果。完成這一歷史使命，需要中國對當代政治經濟學作新的創新和探索。

（一）將時間要素重新納入政治經濟學研究視野

恢復歷史的方法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地位，將時間要素重新納入當代政治經濟學研究視野，在當前具有重要意義。馬克思把經濟理論看成“能動反映論”，所以，它不能被輕易地任意裁剪分割。“經濟理論”不是獨立的，既不獨立於歷史過程，彼此之間也不相互獨立。

改革開放以來，由於要放開和搞活市場，大量西方主流經濟學觀點進入中國，它在一定程度上主導了經濟學研究的問題設置和話語導向。改革的成功、中國奇迹的誕生，使人們容易產生錯覺，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等同於市場經濟本身的成功。其主要原因就在於，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經驗”時，先入為主地將其方法論、背離現實的假定帶入研究情境，而忽略或者說是脫離了歷史的客觀性。在這種研究思路主導下，市場作用被絕對化了，而改革開放前中國的社會主義基礎被市場假定所省略了。這種反歷史方法的經濟學方法論，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話語權在經濟學中被邊緣化了。

其實，祇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就可以看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具有一定的歷史前提，而這個前提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一直強調的。如果按靜態的觀點，則新中國改革前後兩個時期的經濟建設成就的確顯示了市場作用的力量。然而，如果擴展視野，與印度、巴西等其他發展中大國作對比分析，就可以看出，中國經驗是不可複製的。因為，印度、巴西等國在中國改革前的很長一個歷史時期，就長期實行市場經濟並對外開放，卻並沒有取得中國式的成就。可見，中國經驗並沒有按照西方新古典經濟學描述的劇本來上演。而中國當代政治經濟學如果過於強調一般性理論，就無法對中國制度演進的歷史特性作出科學的解釋；因為西方經濟學難以全面準確地解釋“中國問題”^③，更無從解決好中國在發展中面臨的新問題。

可見，在應對未來發展問題時，中國當代政治經濟學需要堅持以我為主，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方法論，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歷史經驗和內在矛盾分析入手，提出經濟學新範疇、新概念，構建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濟學範式和體系。同時，中國也需要立足技術進步，科學分析世界生產體系、生產組織體系的歷史演變和發展趨勢，客觀認識中國在全球生產體系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變化，在全球一體化進程中探索和完善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

（二）摒棄經濟學方法論中的價值中立性原則

在西方經濟學中，其價值中立性原則是建立在理性主義和反事實假定基礎上的，體現的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特徵和西方中心主義的情景理性。而不斷強化的數學化傾向，則是其藉以實現“價值中立”的工具。

這種表面上的價值中立原則，對當代中國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例如，中國在改

① [德]馬克斯·韋伯：《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甘陽等譯，第91頁。

② 烏蘭夫：“對話現代西方經濟學與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中國經貿導刊》3Z（2015）。

③ [日]見田石介：《〈資本論〉的方法》，第3頁。

革開放以來，伴隨着現實中工人隊伍的失語，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對企業內部勞動關係的研究，也大多放棄了馬克思的分析方法。制度經濟學、博弈論、委託—代理人理論等看起來表面中立的理論，一度成爲了企業理論的主流。然而，由於對集體理性和共同體理性的忽略，對企業內部行爲的分析實質上一直是西方主流經濟學中的黑箱，生產過程和勞動過程幾乎被遮罩於理論經濟學體系之中，因此，其關於理性人假設的論斷不過是立足於資產者立場的話語獨白，不可能反映大多數人的意志和利益。這顯然是中國當代政治經濟學發展和創新中必須警惕的。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的重建，需要重新將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方法作爲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將經濟學問題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龐大而複雜的整體中，從多種社會關係的整體中抽象出主要矛盾，來進行考察和研究。同時，更需要將生產關係即人們的利益關係作爲研究的核心，在界定不同社會群體和階級利益的基礎上，探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體系的理論問題。

在重建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中摒棄價值中立原則，需要對西方的“數理經濟學帝國主義”進行客觀的分析。不可否認，數理方法的引入，在方法論方面一定程度上豐富了西方經濟學的分析，使其理論結構更加條理化和簡明化。數學形式主義目前已經成爲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最突出的特徵，是其保證支配性地位的有力工具。^①但是，對歷史傳統的背離，在某種意義上也會導致經濟學本身失去人文和社會性的思考，因固守過時的、錯誤的前提假設而被其他自然學科所異化。在這方面，中國當代政治經濟學固然需要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新的數學分析工具，但更需要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本原理轉化爲適合於現代數理分析的公理和前提假設，並在此基礎上運用數學模型對當代經濟現象作出更具有說服力和前瞻性的解釋，以爭奪經濟學方法論的話語權。

實際上，馬克思經濟學敘述方法中也有公理法^②。馬克思所說的“先驗的結構”，顯然與公理體系的演繹結構有關。公理體系的演繹顯然從正確處理好個別公理與整個理論體系的關係入手，對個體的假設需要預設整體的情境背景。例如，在對微觀經濟行爲主體的假設上，馬克思更重視的是“社會人”而非“經濟人”，這顯然可以爲人們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個體經濟行爲提供更開闊的視野。可見，運用好公理性假設，既有助於簡化和統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命題，也有利於與西方經濟學的假設展開比較。當然，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在科學揚棄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過程中，應更加強調學術嚴謹和貼近現實，而不能隨意假設。

（三）科學應對理論體系構建中的“話語權轉移”

在經濟學研究、教學和理論宣傳工作中，西方社會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存在着一定的過濾機制。“如果沒有某種形式的審查制度，這個世界就不可能存在嚴格意義上的宣傳。爲了進行某種宣傳，就必須在公衆與事件之間設置某些屏障。”^③但在經濟事實難以忽略、理論話語難以被遮蔽的情形下，圍繞經濟學話語權的爭奪通常體現爲話語權的轉移。

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經濟學體系構建過程中，話語權轉移有時也發揮出正面的積極的作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正是通過馬克思關於“勞動二重性”的揭示確立了科學的地位。而自從馬克思的科學的勞動價值論確立以後，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關於價值理論的探討也就停止了，勞動價值理論成爲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代名詞之一。這顯然就是一種話語權的轉移。而馬克思對剩餘價值理論的研究，則使西方主流經濟學遠離了企業內部生產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產生了企業的黑箱理論。西方主流經濟學對在企業內部經濟學研究的失聲，顯然也是話語權轉移的表現形式之一。

在中國當代政治經濟學的構建中，面臨着理論繼承和創新的雙重任務。從繼承來看，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需要不斷充實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範疇、術語概念和話語體系，增強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競爭力，回答好新的時代性課題，增強凝聚力和發展共識。從創新來看，則是要在堅持馬克思

^① 李振倫：《元理論與元哲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第25頁。

^② [美]沃爾特·李普曼：《公衆輿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閻克文、江紅譯，第35頁。

主義的理論架構和分析邏輯基礎上，使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更多地包含中國元素，更多地表現出中華民族文化和思想的特性。

構建中國當代政治經濟學，需要防範西方主流經濟學通過話語權轉移帶來的侵蝕。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時間還不長，在市場經濟制度的很多方面還不成熟，容易被西方主流經濟學用學術話語牽着鼻子走，像美國傳播學家格伯納（G. Gerbner, 1919—2005）所說的被“分配注意力”；即在引進相關經濟學範疇和術語時直接接受其前提和概念界定，使西方主流經濟學達到“給爭論下定義，提供參考術語，來分配注意力和權力”的目的。^①因此，對西方經濟學術語、概念、模型的借鑒和運用，應提高鑒別能力，用批判的思維和科學的態度促進理論的交流與融合。建立在學術自信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是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重建和成熟的標誌。

① [美]斯蒂文·小約翰：《傳播理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陳德民、葉曉輝譯，第575頁。

·學術微信·

2017年3月27日—29日，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中心和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研究中心聯合承辦的“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評價發佈論壇暨學術評價與學科建設研討會”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召開。全國人大、中宣部、教育部、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等有關部門領導出席會議，來自全國各地的人文社科成果評價研究界專家學者、學術期刊與學術機構、新聞媒體代表共計八百餘人參加會議。《南國學術》總編輯田衛平作爲本次會議的演講嘉賓應邀赴會，並在上午的大會上作主題發言，發言題目是“人文社科期刊需要善待外部評價”。

2017年4月22日—23日，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經濟學院主辦的“第九屆演化經濟學年會”，在位於武漢市的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召開，來自全國各地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的六十餘名學者出席會議。《南國學術》總編輯田衛平應邀參加了本次年會。

2017年4月27日—28日，由澳門基金會與中國中外關係史學會聯合主辦的“中國歷史上的白銀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澳門科學館會議廳召開，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雲南省社會科學院、中山大學、暨南大學、河北師範大學、香港嶺南大學、澳門大學、臺灣清華大學、東京大學的二十餘位學者出席會議。《南國學術》總編輯田衛平應邀參加了本次研討會。

2017年4月29日—5月1日，由華南師範大學文化與文學研究所主辦的“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新動向”研討會，在位於廣州市的華南師範大學召開，來自香港、澳門和內地高校的二十餘位學者出席會議。《南國學術》總編輯田衛平應邀參加了本次研討會。